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成立四十周年

校友访谈录

杏坛弦歌处
紫荆花又开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40周年纪念——校友访谈录

杏坛弦歌处 紫荆花又开

主 编：刘惠琴

副主编：张 羽 乔伟峰

责 编：秦颖超 桑 迪 康逸飞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可 王 亮 石琬若 叶晶美奇 刘金晶 刘春宏 刘威童 衣芳青

杨舒媛 吴 帆 何 影 张蓝文 周圣钧 周京博 周溪亭 郑 湘

郝亚辉 黄 丽 黄 浩 黄钰婷 黄鲸慧 崔依冉 康逸飞 韩玉莹

窦文韬 蔚墨新

目 录

序	I
1994 级硕士研究生刘惠琴访谈	1
1995 级硕士研究生吴晓蓉访谈	7
1996 级硕士研究生张圆圆访谈	16
1997 级硕士研究生王燕访谈	20
2002 级硕士研究生、2009 级博士研究生赵琳访谈	27
2004 级硕士研究生、2011 级教育博士管恩京访谈	33
2004 级博士研究生孔钢城访谈	39
2005 级博士研究生黄晟访谈	42
2006 级硕士研究生、2013 级博士研究生詹逸思访谈	45
2009 级硕士研究生谢梦访谈	48
2010 级博士研究生陆一访谈	52
2011 级博士研究生王顶明访谈	59

2012 级硕士研究生史安璐访谈.....	66
2012 级博士研究生马婧访谈.....	72
2014 级硕士研究生周雪涵访谈.....	76
2014 级硕士研究生沈阳访谈.....	79
2016 级硕士研究生狄迪访谈.....	83
2016 级博士研究生丁若曦访谈.....	87

序

2019年10月26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将迎来建院（室、所）40周年华诞。在此，谨向长期关心、支持教研院建设和发展的各级领导、教育界人士、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回望40年的发展历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始终与国家教育发展和清华大学的建设同向同行，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坚持“顶天、立地、育人”的传统，以“培养优秀人才、探究高深学问、服务社会民生”为己任，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40周年院庆既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又是迈向新征程，开创新辉煌的重要机遇。40周年院庆将是全体教研师生

畅叙情怀、放飞理想、交流学术、凝聚力量、共谋发展的盛典。同学谊，
将在盛典中再续；教研情，将在盛典中升华。

借此时机，清华校友会教育研究院分会组织采访了部分校友，致敬
历史，分享故事，畅想未来。

清华校友会教育研究院分会

2019年10月

1994 级硕士研究生刘惠琴访谈

刘惠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兼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生教育研究》编委会副主任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副主编。清华大学工学学士、教育学硕士、管理学博士。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刘惠琴：我保留入学资格在机械系做教师并兼任系团委书记，后被研究生院领导看重要求到教育研究所攻读教育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研究生院工作。

教研所的两年学习，在为学为人上带给我许多变化。首先是开拓了视野。原来学机械都是和工程、工业相关，来到教研所以后，不仅对教学论、课程与教学等有了认识，而且对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加深了解，使我对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工科教师到教育

学硕士，使我对教育有了全方位、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所以，我很感谢组织的培养，使我能够具备跨学科的思维方法。

我的导师是当时的研究生院领导林功实和白永毅老师，他们既是某学科专家又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师从他们读研究生，使我见识了学校高层思考问题的方式、各种改革是如何推进的，而且也参与起草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在这个过程中锤炼了思维、开拓了视野，同时校领导们爱生、爱校、爱国的胸怀，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自己的为学为人方式。

总之，在教研院学习的那段时间使我受益匪浅，对今后的为学、为人、为事非常有帮助。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刘惠琴：我 1994 年在教育研究所读书，教研所在老图书馆地下一层。那时候人少，六个人一个班，课堂完全是研讨的形式，授课老师跟我们坐在一起。这种深入讨论式的教学，对学生思维的启迪非常有帮助。当年老所长江丕权先生给我们上的《教学论》，让我对教育教学有了深入的了解，很有特色；还有王笃美老师的统计课程，使我对数理统计在

教育方面的应用有了认识。在课程方面，不仅学到了关于教育的许多理论、方法，而且学会了学以致用。

教研所一直有结合清华的历史做教育研究的传统。比如，我的硕士论文为《工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清华的工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到底和哪些因素有关，我采访了清华许多知名院士及其博士生，了解工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到底应该怎么培养、和哪些因素有关，在实际培养的环节需要哪些帮助？当初硕士论文选题一定是要与学校的发展密切结合的，这是教研所当时比较有特色的点。

人要对自己的身心有要求。在上学期间我会主动锻炼，每周会跑两到三次的步；我喜欢跳舞，跳跳集体舞、交谊舞，既锻炼了身体、又接触到不同的师生，广交好友。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刘惠琴：教研院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读书的时候，五六个专职老师，一批部处长任兼职老师，发展到现在具有教育学的一级学科，有工程教育、高等教育、教育政策与管理、教育技术、研究生教育等特色

方向，在全国综合类教育学院中位于前列。我们目前虽然只有 20 名左右教师、是全校体量最小的院系，但是已经在清华甚至是全国的教育政策建议和改革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支撑作用。“双一流”课题、研究生教育课题等我们都是牵头单位。

希望今后能够更好地布局，不仅在教育实践上有所发展、教育政策上有所支撑，还要在教育的基本原理上、基本理论上有所突破，能够通过我们教研院的研究，真正解决学习的机理、学习的有效性，带动全球教育范式的变化，希望能够和中国甚至世界的学者一起，在未来教育和学习方面起到领导者的角色。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呢？

刘惠琴：要通过“融合创新、立德树人”，做引领性的教育研究院。

首先，在教育学方面要做一流的引领性研究。比如未来教育与学习科学，与人工智能、计算机、脑神经、心理等都有交叉，将这些应用在教育上会对未来教育范式有所创新，哈佛、斯坦福都在做这些研究，国内要由我们来引领。第二，要凝聚力量、加强院校研究。教育研究院作为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具有服务院校的使命，必然以清华为对象进行研

究。从 1979 年建教育研究室就要做院校研究。我们要结合清华的实践和清华未来的发展，为清华的各种改革实践提供更好的谋略方针，为清华人才培养提炼出特色，结合清华实践提炼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思考等。第三，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在研究生教育、工程教育，“双一流”等方面我们已经成为政策智库，希望能够与兄弟院校一起，成立中国数据调查研究中心，搭起一个中国教育数据积累和可持续发展的平台，为科学有效的决策提供依据，服务国家和社会。最后，希望毕业生有更好的发展。毕业生要到以教育为主的行业去，无论去政府还是教育行业或者自己创业，要把研究与实践做在祖国改革与发展的大地上。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刘惠琴：首先，希望我们的校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希望我们的校友能够回馈母校和现在的学生，建立起校友群，形成联系纽带；也可以邀请校友做辅导员，为我们的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好的指导。同时，希望我们的校友为教育研究院的发展建言献策，我们会不断改进

工作，让我们共同努力、砥砺前行，使教育研究院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院，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好更多地有用之才。

1995 级硕士研究生吴晓蓉访谈

吴晓蓉，1998 年 6 月毕业于清华教育研究院教育管理专业，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曾任宝能集团、爱国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慧聪集团、联想集团高管；现任北京易享生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清华房地产协会理事，全经联养老委副主任，开拓了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与运营业务。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吴晓蓉：因为我觉得教育一直是中国挺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我记得我到教研所念书时是 1995 年，毕业时是 1998 年，学制三年。虽然当时清华、北师大、北大、华东师范几所院校设置了一些高等教育相关的专业，但是那时国家在高等教育研究上还没有非常普遍，至少不像现在这样。当时类似于北师大这样的师范院校，在幼教和普通学校教育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高等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它的学科如何设置、

如何管理等等，其实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来教研所学习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等等。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吴晓蓉：关于学习和研究：我特别喜欢刚建校的时候就有的老图书馆的氛围；当时有一整层都是教研所老师的办公室，我们有自己的图书资料室，那时候我好像天天泡在那里，那种感觉还挺好的。我当时的导师是江丕权教授，他应该是第二任的所长，我记得当时他用游戏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进行思维训练，比如问题有不同的解法怎么找到最优解，这就是思维训练的过程。后来江老师联系了国外研究这方面的一些专家，我记得当时跟丹麦有合作，我们还一起去研究这个课题；我记得当时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发到咱们教育研究上面。

关于生活：我觉得清华当时的人文环境还没有现在这么浓厚。因为清华文革的时候进行了院校调整，逐步地把理科放到北大，文科最后也几乎没有了，就相当于工科院校。后来又逐步恢复，包括经管学院、人文学院，实际上当时我们教育研究所是属于人文学院，我们班叫做文研5，文研5里边大概有六七个专业，法律、思政、历史、教育研究等六

七个专业都在人文学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同学之间因为都是研究不同的方向，所以直至现在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经常一起聚会），大家会从不同的视野去看待这个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有很多同学都发展得挺好。

记者：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吴晓蓉：我觉得挺有帮助的。一方面，专业学习过程训练的是我的思维方式，这个对我后来的工作等等都很有帮助。比如毕业后我在企业工作，我先进入联想集团做培训。培训其实跟教育息息相关，我们当时推广的一些（培训）项目，它实质上也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比如如何在企业里去解决问题。包括我自己现在创业过程中，我一直在找适合这个行业、适合企业发展最可行的最优解，每天都是这样，而且（这样的过程）会训练你决策的思维方式，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好的。另一方面，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确实是特别受益终身，应该说没有一天不被脑子过一遍，我觉得这个校训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包括我们企业的 logo，我现在设计的都是和这有关。因为我们公司是两位清华校友创办的，所以我们也是秉承清华的精神，思考基于互联

网时代怎么引领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社区居家养老这个行业里头去做出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言，“自强不息”——清华人几乎都有，而“厚德载物”我是工作中后来学到。因为我后来做了管理工作，你只有厚德载物，天天为别人着想，才能把团队带起来，真的是受益终身，所以我特别感谢教育研究所。

还有一方面就是三观。现在我接触的很多 90 后，包括 80 后，他在工作生活中面临困境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都是因为三观出了问题。我一直在说一句话，只要目标明确，坚持原则，不断实践，没有做不成的事。虽说“四十不惑”，但是其实四十之前是最容易疑惑，这时候关键就是你自己的目标是否清晰、三观是否正确，当你要从事的事业和你周边的生活有冲突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它一定是可以平衡的，而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其实是不清楚的，或者是直接走向了极端。但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用他们的“中庸”教育思想告诉我们，要全面地去看待世界，然后去抽取他要去做的重要的东西，并加以整合，这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还有一件事，最早我从企业高管来转型创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清华，来自清华校友之间互相支撑的天然的那种联系对我们支持非常大。正好我知道清华要修缮钱钟书、杨绛先生的旧居，我们就自己掏钱，把钱先生和杨先生的旧居——他们 50 年代居住的地方——进行了修缮，现在成为校友驿站，既是水木清华杂志社所在地，又是校友交流合作、为学校和社会的发展来商谈一些事情的地方。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在教研所的学习生活的。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吴晓蓉：我觉得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壮大，那时候我们班大概是六个人，六个人都是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专业的，我们应该算是教育研究所的第四届研究生。我记得我们刚毕业那会儿，学院总是举行聚餐，也就是每年的 12 月 31 号，聚餐的人数一年一年地在增多，还是挺好的，能够看出学院不断地在壮大。

除了学生规模上的变化，教研所的变化在其他方面也都是能感受到的，比如培养的人才。其实我每次回去我都能感觉到学生的视野、素质

各方面都在提高，也能感觉到教育学是一个蒸蒸日上发展的学科，我觉得教育研究院也许现在已经做到了对学校教育的一些影响，包括整个教育学的影响，已经从深度上做到了和整个社会大的经济发展的脉络的吻合（我当时教育离经济还是比较远的）。总体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记者：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从教育研究室，到教育研究所，到教育研究院），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吴晓蓉：第一个是学校设置要把它往跨学科发展，可以说和深度发展相结合，培养立体化的人才。实际上这个世界现在有很多专业都已经没了，假如等到物联网来了，职业都没了，您还教这个，工程教育还教这个；电脑没了，都变手机，都变芯片了，放在眼镜里，放在手表里；物联网走到哪，哪里就有人和物相连、物和物相连，各种相连，你还学那个有必要吗？你会发现知识已经过时太多，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我觉得它是根本，是教育最终立本的东西。清华的人为什么在外面能够让人觉得真的靠谱，就因为清华的校训，说白了就是这个精神，你学那东西（知识）都过时了。另外，现在国家经济转型，急需跨学科发展的人才。清华现在的学科设置都是高精尖的，也比较重

视医药、大健康这些方面。我在工作中发现按照以往的学科分类已经不能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我现在做的养老行业，它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涉及吃、玩、护、养、学、居这六个方面，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只通过一两个学科的人才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建议高等教育应该率先做出跨学科的整合，而且这个整合的初衷是以人为本的，是符合人的发展阶段和人的发展需求的。现在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也就是随着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平均年龄普遍增高，全球的老龄化比例越来越高，中国的老龄化比例甚至更高，这就会派生出越来越多的需求，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就需要跨学科的整合——无论是工作上的跨部门的设置还是跨学科的学习教育，都需要横向的整合。

我觉得这种整合早期可以以项目制的方式，在学校开一些课题，由几个院系的老师共同去整合、共同去做。据我所知，清华有些院系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说还是不够，还是应该设置这样的学科、这样的专业，然后推动国家去设置这样的职业，我想清华是有这个力量的；而且我想在国际上肯定也会面临着这样跨学科的发

展问题，所以这点也是我的一个建议，我本人也非常愿意参与到学校的跨学科建设过程中来，去推动这样的跨学科建设。我相信教育研究院肯定也愿意参与清华学科的设置，甚至国家高等学校相关学位的设置。当然，我自己也非常愿意参与进来。

第二个就是要跟上时代，清华更重要的就是还得引领时代。我觉得清华一直都是教育学生要心怀天下，但往往心怀天下以后有的人就容易怀才不遇。那你为什么怀才不遇？我觉得还是没有把一些根本的东西抓住，他只是会学习，但真正到工作岗位上，你在岗位上还能学吗？你怀才不遇是因为什么？你高考可能考得挺好，你真正学习的时候你还行，但是工作期间别人就会超越你。没有说谁非挤兑你，只是你不适应。包括你跟团队之间怎么学习，跟别人怎么相处，你的情商、智商、逆商，一旦遇到点困难就没有办法度过了，这些都是教育。这可能是我从教育理念上的一些想法。我记得邱勇校长在一次新生讲话的时候提到了“向美而行”，就说“清华要懂得科技之美、艺术之美，而且我们要用一生去追求人性之美”，我觉得这说的真的是非常好。清华现在非常强调人

文精神，你会发现理工科的很多东西都是冰冷冷的，有了人文的东西，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不一样了。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吴晓蓉：有机会我还是挺愿意回到所里的，尤其是校庆期间，大家一起聚一聚，（教研院）总体上真的是越来越好，我相信在国家高等教育中的影响肯定也是越来越大。

另外我也可以给我们教研院的学生提供一些实习机会。比如说我们做市场活动的时候你们参加，包括来我们的样板间做参观接待、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些推文进行推广。只要你们需要，易享生活就会敞开大门。你们可以利用暑期到这来实习，不管时间长短，即使是周末组织活动的时候，只要你们愿意过来，我觉得都可以。或者说业余时间你们愿意兼职，做一点比如说文字的工作帮助我们去推广，写推文，我觉得也可以。另外，从学生的成长发展角度，我也愿意到院里和你们做一些交流，以及参与一些论坛或者职业发展指导规划的讲座等等。

1996 级硕士研究生张圆圆访谈

张圆圆，清华大学电机系 1991 级本科生，教研所 1996 级硕士毕业生，1999 年毕业，做过 5 年公司职员、4 年半研究生招生管理人员、8 年半学位管理人员，现于清华大学纪委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记者：先请您大概介绍一下您的学习工作经历。

张圆圆：我是电机系 91 级的本科生，96 年毕业推研的时候推到教研所（学生挂靠在当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法学院、新闻学院、马院，所有人文社科类的研究生，除了经管学院是独立的，其他的都在人文社科学院。我们这届教研所录取了 4 人，我是电机系的，孙宏芳是环境系的，金晓红是机械系的，潘宇红是从外面考来的。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到教研院学习呢？

张圆圆：其实有些碰巧吧，算是有人介绍，我才对教育这个领域感兴趣，就跨专业到了这边。

记者：那您在教研院的学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呢？学习经历也好，科研也好，社工都可以，能简单谈一下吗？

张圆圆：我觉得其实在教研院学习期间，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自己的老师，我的导师是教务处原副处长宋烈侠老师。她今年6月刚刚去世了。她对待工作要求很严格，但待人是温和的，尤其是对下级、后辈很关心。

记者：您刚刚谈的主要是学习方面，那您在教研院期间，有没有参加学习的社工或者之类的呢？

张圆圆：我当时可能是研团总支的副书记吧，不过我们好像没怎么组织过跨年级的活动。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没做过“主要干部”，感觉自己受的锻炼不太够，在工作中明显感觉到不如做过“主要干部”的同志能力强啊。不过，换个角度看，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能力强，当年才做了主要干部。

记者：那您觉得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张圆圆：我本科是工科，研究生阶段接触社会科学，感觉差异挺大的，在学生时代经历了这个转变，挺好的，对工作生活有促进。

记者：那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來，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张圆圆：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教研所还在老馆楼下，记忆中很小很暗，但是当时的老师们，江丕权、李卓宝等老教师，王孙禺、李越等青年教师，还有叶富贵、罗燕等年轻教师，对我们都很关怀，现在提起教研院，最想说的还是感谢学院、感谢老师。而且我上学那个时候教研院没有博士生，硕士每年也就几个，现在队伍非常壮大了。

记者：您也提到了教研院的队伍现在在不断壮大，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那您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吗？

张圆圆：就期待学院越办越好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一定也会积极参与，为教研院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吗？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张圆圆：这好像一时也说不上。但现在通信便利了，校友们也建立了校友交流群，大家可以及时沟通，学院有什么需要就说一声，能参与的就参与一下吧。

记者：您对在读的师弟师妹有什么寄语呢？

张圆圆：研究生阶段，又要多读书，又要学着多做研究，又要多做社会工作，时间总是不够用，但这三样我觉得都重要，因为还是学生的时候也罢，工作之后也罢，都是要同时做许多事，那就从读书的时候练起吧！读书的时候把基础打得扎实一些，锻炼自己多方面协调发展的能力，包括学习能力、研究能力、时间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日后会受益无穷。

1997 级硕士研究生王燕访谈

王燕，1997 年至 2000 年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就读硕士，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工作。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3 月赴美国雪城大学做访问学者，2010 年回国后于清华大学科研院从事科研管理相关工作。

记者：请您大概介绍一下您的学习工作经历。

王燕：我是 1993 年—1997 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工程医学的本科，1997 年—2000 年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读的硕士，毕业以后留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工作。2009 年 3 月份—2010 年 3 月份去美国雪城大学做访问学者，2010 年回国以后我就到了科研院来做科研管理的相关工作一直到现在。

记者：那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到教研院学习呢？

王燕：其实对我来说是跨专业的，从工科到教育管理这个领域，我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背景，我们当时一年硕士就招五个同学，有四个都是在清华校内保送的，他们也是来自于物理、汽车这些相关的专业。我觉得这是因为教育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学科，它要去研究高等教育的各种现象、各种理论规律，需要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们汇集在一起，从学科的角度来讲，有这样一个可容纳量。从个人的角度是因为我在本科期间，我们的辅导员，他们在做高校管理的同时，也在读教育管理的硕士和博士，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领域，当时杨叔子校长那几年在全国都提倡素质教育，咱们清华大学当时很多先生也是去做报告，我听了相关报告后深受启发。所以接收到教育相关的很多信息，最后影响了个人的决策。

记者：那您在教研院的学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呢？学习经历也好，科研也好，社工都可以，能简单谈一下吗？

王燕：我觉得其实在教研院学习期间，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自己的老师，王孙禹老师是我的导师，王老师一心为学校、一心为学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德高望重、很尊敬的一位老师，他给了我们特别自由的一

个学术环境，例如说我们研究的课题有很大选择的空间，王老师都鼓励我们、支持我们来做这些事情。不仅在学业上，在生活上，在各个方面对我们支持都很大，不仅对我，其实对我的师兄、师姐，对我的师弟师妹们都是一样的，所以王老师培养的这些学生，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毕业以后我们大家还会经常的和王老师去请教，得到王老师的指导，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第二点，真的经历了教研院不断发展的过程，咱们院的老师越来越多，老师的来源也更加多元化，大家对清华的发展都是属于烂熟于心，各种各样大的事情都非常了解，现在像史老师、石老师，包括李曼丽老师，他们很多的这些学者聚集在一起，这个学科的力量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发现，以前有很多经验性的研究，现在有更多理论性的研究，从定性的到定量的，从偏实践到哲学层面的，越来越丰富，我觉得这种范式其实都在影响着我们看待教育的视角。

记者：那您刚刚谈的主要是学习和科研方面，那您在教研院期间，有没有参加学习的社工或者之类的呢？

王燕：社会工作我当时是参加过研团委的工作，研团委刚好是有一个报纸，好像是清华研究生类似这种报纸，我在里面做编辑相关的工作，通过一个学校这样一个学生组织的平台，也认识了来自不同院系的同学，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回忆。

记者：那您觉得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王燕：我觉得它是使得我对教育领域发生的现象保持兴趣，从粗浅的兴趣，变得要从更专业的视角，然后来看待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待它的发展规律，另外从哲学、社会学，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种现象。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说给了我一些思考问题、看待问题的一些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做研究的一些规训，也是非常大的一些收获。

记者：那您现在对于教研院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您觉得这 40 年来教研院有什么样的一种发展变化呢？

王燕：我其实没有经历那么长，其实从 2007 年过去，大约十几年的历程，这十几年里面觉得教研院确实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师资力量、学科的方向、学术的氛围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在学校里面的影

响力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像我们每次一些重要的思想讨论包括工程教育，咱们教研院的老师和同学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点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桃李满天下，我们在学校里面各部处走一走，就会发现好多都是教研院毕业的老师，或者是同学，有的是毕业以后到机关工作，有的是在机关同时还在教研院做在职的硕士或博士的，所以教研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为学校的教育管理、培养方面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支撑和人才的输送。

第三点，咱们教研院有一些导师实际上在学校里面做实践工作的领导，或者是有研究的老师，他们也带给我们教研院在校学生学习的一种视角，因为教育是一种实践性比较强的，从书本到书本是一种学习，但是从实践结合书本，结合理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所以我们能听到很多老师他们的课程，非常体系化的课程，在学校平台进行开展。包括我知道你们现在也有课程会涉及学校教育管理的事情，各部处的处长每人讲一个专题，这样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互动。

记者：那您对教研院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期望，或者建议呢？

王燕：其实现在教研院也是在刘惠琴老师、石老师带领之下，也在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石老师在北师大教育领域里面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惠琴老师也是毕业于教育研究院，同时他在学校的管理方面也有非常深厚的基础，我觉得在他们的带领之下，肯定能够迈上新的台阶。据我了解，在成果转化，像程建刚老师他们团队的成果转化，包括在与企业的合作，惠琴老师和李曼丽老师他们参与的都有很多，包括王孙禹老师他们做的工程教育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合作，当然还有很多像史静寰老师牵头的这些都是非常有影响力，所以我非常看好教育研究院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想作为一名毕业的院友，也很愿意尽自己所能，能够为教研院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您刚刚提到院友这个问题，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或者说您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再参与到教研院的校友工作中？

王燕：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学校的校友工作体系是非常完整，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通过最近这几年每年的校庆就会发现，除了程序化的一些活动以外，多了很多很温暖的、像家庭大团聚这种活动和安排，我觉得都特别好，教研院的影响规模是在逐渐的扩大，所以校友工作这一

块，我想未来投入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视，所以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学校里面整体体系的安排和其它相关院系一些工作的特点，就可以发展起来，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

记者：那您对我们，对在读的师弟师妹有什么寄语呢？

王燕：两个方面吧，我觉得第一点还是要练好基本功，这里面对于教育的，尤其是说哲学理论的这种研究的方法，这些方面一定要打好基础。第二点还是要抬头看路，要多与实践相结合，例如说教育领域里面有哪些截至目前最新的一些探讨；例如说科研管理领域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在学科的规划方面等等大家感兴趣的教育相关领域，要去关注国际的发展趋势，清华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内高校整体的动态，因为理论和实践对于高等教育咱们这个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两手都要去关注，都要抓。

2002 级硕士研究生、2009 级博士研究生赵琳访谈

赵琳，2002 年至 2005 年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2009 年至 2015 年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副主编。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选择来清华教研院学习呢？

赵琳：我本科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对教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个时候，除了学习中文系的专业课以外，我还修读了教育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在考研的时候，抱着试一试、争取到最高学府学习深造的想法，报考了清华大学。我还记得当时来参加考研面试第一次走进清华校门时候的心情，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确定是否被录取，就已经感觉非常激动，从校园建筑到师生风貌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不愧是中国最高的学府、最一流的大学，我更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进入这样的学校和研究所学习（当

时，教研院还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下面的一个研究所)。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运被录取，学习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在教育研究所接受教育，接受老师们的指导，后来又留下来工作，再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习和深造的初衷始终未变，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和最好的研究氛围。

记者：请问您在教育教研院读书的时候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

赵琳：我主要说说自己硕士阶段的事情吧。我是 2002 年作为硕士研究生入学的，那一年我们一共有 14 名硕士生，大家在一个班级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跟这些同学在一起的一些活动。14 名硕士生中，好像有一半是清华本校推免的研究生，还有一部分是像我这样从外校考进来，大家的沟通交流和集体活动特别多。那时候，教育所的空间还是挺小的，只有文南楼四层的一半，但所里还是给我们学生留下了比较充裕的活动和研读空间。我记得入学注册的第一天，所里就安排了破冰活动，帮助大家尽快融入集体，那时候所里还有两位教心理学的老师，给我们

做团队建设，所以一来到教育所这个大家庭就感觉很温暖，同学们也很快就形成了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在硕士阶段，还有一件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读硕士的时候，对外合作交流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和广泛，但我记得那时所里出了一笔经费支持我们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这对于我们这些硕士研究生特别是从外校考进来的学生来说，觉得机会特别难得，是在以前的学校可能不太能想象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个学术会议的主题是“学生赋权”，就是让学生更有权力、让学生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同去的很多同学都在分论坛上发言，参加讨论。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教育所在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让我们这些硕士生出去交流，说明十分重视人才培养。

记者：您觉得在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赵琳：这个帮助就真的是太大了，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方向。我到教育所读书，接触到这么高水平的老师和同学，硕士毕业后留校留院工作，到如今可以为院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所以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对于我的改变和培养，不仅仅是短短的一段受教育的

经验，而是对于我整个职业生涯和人生发展都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留在清华、留在教育研究院工作，又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越来越觉得教育研究院作为一个个人发展的平台，对于我来说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平台上，总有着一种力量推动着我、督促着我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思考、不断地成长，前面永远有一个新的台阶等待你去迈进。所以我觉得教育研究院对于我的影响真的非常深远，我也相信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再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会比我现在的体会还要更深刻，我相信这一点。

记者：您觉得从来到清华教研院到现在，教研院有什么改变呢？

赵琳：改变非常大。有时候跟我们这一级同学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说你天天都在院里，所以院里的变化你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感受。我跟他们说，恰恰相反，我的感受特别明显。很多我这一级的同学都是校庆的时候回来或者是隔一年校庆又回来，他们都觉得院里的变化挺大的，我说你们是一年有一次这样的感受，而我是每一天都在经历和见证院里的一步发展。

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教研院的师资队伍和学生情况。从师资来看，2002 年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好像也是我们的常务副所长史静寰老师来清华工作的第一年。我记得在我入学做团队建设的时候，史老师来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说，你们是教育研究所的新成员，她说她本人也是新成员。慢慢地，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新老师越来越多，包括林健老师、钟周老师，还有近一段时间来的石中英老师、Hamish Coates 等，这种师资上的变化特别大。像史静寰老师、石中英老师、林健老师等都是咱们院特别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他们的到来对于我们院的整体发展真的意义重大。人才培养方面，我也深有感触。我们那一届只有 14 名硕士研究生，2019 年的硕士和博士新生共有 60 多人，但从规模上就扩大了很多。而且人才培养项目也越来越丰富，你看现在我们的培养项目，既有硕士，又有博士，还有专业博士，另外还有本科辅修项目。

记者：您对教研院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赵琳：说到期望，肯定是希望我们院人才培养的水平越来越高，学科发展的水平越来越高，在全国乃至国际的教育学科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学科，发挥引领的作用。关于建议，我也特别愿意

多听取各位领导、老师、校友、学生的意见，然后作为现任班子成员，把大家好的建议具体化为建设院的具体举措，并通过我的工作落到实处，切实推进教研院的发展。

记者：您还有什么感想想对同学们说吗？

赵琳：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多交流，院里所有老师们的办公室大门永远向同学们敞开，对于院里有一些新的想法、好的建议，都可以坦诚地开诚布公去谈，同学们有自己看问题的视角，老师们也有，大家一起交流。我相信教育研究院会以四十周年院庆为发展契机，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2004 级硕士、2011 级教育博士研究生管恩京访谈

管恩京，硕士和博士阶段分别师从韩锡斌老师和林健老师。目前担任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导。是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管恩京：2003 年九月的一个下午，我受人之托去拜访一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老师，在等待他的时候，坐在老图书馆北门东侧一条石凳上小憩。此时的清华园，秋高气爽、橙黄橘绿，高大的梧桐树偶有落叶飘下，古朴的老图书馆在下午 5 点钟还算明亮的阳光下出现一些剪影的效果，显得更加厚重和典雅。凝望着老图，就对她的“质朴”特别有感觉，那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愉悦和放松，内心又特别沉静，真的灵魂出窍了。我当时已经在复习考研，目标是上海的一所大学，那一刻就突

然默问自己，为什么不考清华呢？后来，奔着心中的那种“质朴”感觉，经过一番废寝忘食的学习，顺利进了清华教育技术研究所，当时的学籍管理还不是教研院，还在原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但是，当时技术所和教科所关系已经密切，我的论文开题和答辩，史静寰老师都是评委。再后来，毕业工作几年后，又想读博，一是怀念清华园读书的日子，想再回那个园子，二是清华的学生不能再降低自己的要求了，国内高校除了清华，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2011年，又考取了清华的教育博士。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管恩京：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只能挑几件说说了。教育技术研究所的管理之严是出了名的，不知道现在是怎样管理的，我们那个时候，研究生都是要“打卡”到实验室的，每天要写工作进度，程建钢老师和韩锡斌老师只要在家，每周都要组织我们开会交流。我由于在高校管理岗位上工作了几年，本身也属于比较自律的那种，更重要的是也认同“严师出高徒”这个道理，因此，我对技术所的这种管理模式比较适应和赞同。现在，我在目前的学校，潜移默化中也在按照“严管厚爱”的方式培养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也希望技术所能继续保持和优化这种方式。

由于我骨子里不是一个喜欢或者擅长积极表达和表现的人，再者，在牛人众多的清华，也确实感觉自己智商上有差距，所以在进入实验室后一段时间内表现非常一般。当时，其他同学纷纷进入项目，而我只能根据导师的要求，坐在板凳上“看文献”。比其他同学多看了半年文献后，我才慢慢进入项目。从开始参与一个系统的模块，到中间主持设计一个系统的模块，再到最后主持完成北京农业学院与技术所的一个完整的科研合作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生铁在炼炉里不断得到溶化、除尘、提升。因此，古人云“板凳要坐十年冷”，做研究也一样，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扎好马步，练好基本功，要相信导师对每位学生的判断和定位，相信清华导师一定是“因材施教”。

《诗经-小雅》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跟着林健老师读博“不容易”，首先，得克服对林老师的“敬畏感”。林老师在公共管理、工程教育、学校管理等多个领域造诣很深，是顶尖的学者，同时又做过多年的大学校长，经验丰富，不怒自威，气场强大。跟身材高大，又不苟言笑的林老师交流，小同学、新同学容易怯场。当你慢慢习惯和熟悉他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他很可爱，也喜欢美食，也爱野驴，偶尔也会跟学

生八卦，活脱脱是位外冷内热的暖男。其次，还必须对林老师心存“敬畏”。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同学们做学问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话不多，但一针见血；他不面面俱到，但点拨的都是问题核心中的核心；他在你论文答辩之前管得很“苛刻”，但后面就比较宽松；他平时可能没空搭理你，但关键时候会给你站台撑腰，前提是，你一定要敬畏他，实际上你是敬畏了“学问”。其他跟同学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的各种乐事太多，有机会再聊吧。

记者： 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管恩京： 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自己“三观”的影响，非常深，对工作和生活帮助，非常大。“爱国奉献，追求卓越；脚踏实地，刻苦学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精神已经镌刻到自己骨子里去，尽管我还做得不够好，但是对这些精神的追求是永远的。教研院对教育博士的培养目标是“行业内有一定影响的教育者”，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好，符合学校的办学层次，符合清华教育学科在全国的地位，我也正在努力使自己往这个目标靠拢。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从您在教研院学习至今，您觉得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管恩京：学校自从整合相关资源成立教育研究院以来，党建、学工、教务等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成果明显，科学研究方向逐渐聚焦，学术成果更加丰硕，部分研究团队或者教授在全国相关领域有很高的声誉和较大的影响力，清华大学的教育学在全国的学科排名也比较靠前。

记者：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您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管恩京：建议教研院能把内部的资源继续整合优化，围绕研究院在工程教育、高校评价（CCSS）、教育技术等已经在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研究领域，持续聚焦，在人才引进、职称评聘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当前中国教育的两大目标：公平与质量，首要的是公平。清华的模式非常值得研究，这是教研院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清华太独特了，她的模式、经验、做法，离开了清华，较难推广应用，而 2000 多所地方高校恰恰承担了国家 80%以上的人才培养重任，因此，教研院应

该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广大的地方院校研究，带领和帮助地方院校为国家培养更好的人才。

记者：您作为校友会理事，您能聊一下平时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的？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

管恩京：每学期组织一次校友返校，建立全国校友通讯录。春季学期可以跟校庆结合起来。

2004 级博士研究生孔钢城访谈

孔钢城，现任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4 级博士研究生。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孔钢城：我本科就读于清华中文系，大四在做学生辅导员。因为我做学生工作，所以对教育管理有很强的兴趣，想在研究生阶段更好地了解学生和学校管理方面的内容，从而获得一些更加专业的知识。所以我在面试保送地时候选择教研院。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孔钢城：印象最深的是科研方面，尤其是跟导师王孙禺老师做科研的经历。我的毕设也是从跟王老师做的课题研究中发掘出来的。当时王老师有很多国家教育部、研究院的课题，我从上课到做研究再到最终完成博士论文，自己感觉都是很好的锻炼。课程学习上，我的专业是公共

管理，专业课和基础课在公管学院，那里的课程比较完备。当时，公管学院有很多关于政府管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宏观经济政策等等的课程。通过上这些课程和课上的学习交流，为我在公共管理方面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记者：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孔钢城：我在清华待得时间很长，从本科、博士再到毕业后的学校工作，在延续性的过程中，感觉教研院整体的氛围很好。师门层面，王老师支持我的社会工作，博士阶段我也未间断工作。这段经历对我的能力提升帮助很大，尤其在沟通、组织方面。课程方面，教研院的课程对于政府部门工作有很多专业性的指导，现在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如习近平主席提倡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孔钢城：规模变大了，专业学位点更加丰富；这么多年从事学生培养，院里的学生已经遍及各个行业、领域、省份，桃李满天下；教研院有很好的传承，从教育研究室、教育研究所再到教育研究院，在发展中

师门的传承、学院领导和老师的传承都能够体现出来。因此，教研院的师生关系、教师群体关系很好，教研院整体给人一种很温馨的家的感觉。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孔钢城：期望教育研究院越来越好，成为国内一流的教育研究机构，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建议教研院聚焦于深入的领域，更好地成为一个领域的智库，在发展中深挖我们的优势。目前院系的规模有限制，因此更应该聚焦于专业领域，发展自己的特色，成为高水平研究机构，培养更多高层次、高素质的教育管理人才和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孔钢城：校友会学院联系校友的纽带，希望今后多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邀请大家多回来看看，并结合大家的发展有主题地对院系发展作研讨和交流。希望教研院聚焦于学生培养，加大在校生和毕业校友之间的联络，将有需求的学生和对口的校友联系起来。在外的校友比如我就很乐意与学弟学妹交流，这样不仅对在校的学生有帮助，也可以让已经毕业的学生为院系做一些贡献。

2005 级博士研究生黄晟访谈

黄晟，2005 年至 2011 年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常务副部长，燕山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现任燕山大学党委副书记。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黄晟：我在清华念的本科硕士，念博士当然选咱们学校。我念的是教育经济与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的分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黄晟：当时几个老师都特别好，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有几位。各位老师做学问都很认真。王孙禹老师上课非常精彩，而且他还是我的导师。教研院的史静寰老师，看着很严厉，其实很温和，对学问的要求很高。叶富贵老师、袁本涛老师和李越老师都特别好，这些老师上课也都上得

特别好，我当时学得也很认真。我平均学分大概 90，在我看来每门课都特别管用，所以我学的也特别认真。我记得当时教研院一位老师在清华开了一门课，叫“学校教育与管理”，讲得很好很生动。因为我现在一直还在大学里面做教育管理，所以我觉得这门课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帮助。老师们做科研就更不用说了，科研上老师们更加地认真。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黄晟：我觉得教研院现在比当时水平更高了。老师们学问做得越来越好，国际化程度也更高了。但是因为现在也没再去听课，我也不知道现在上课有哪些老师，讲得怎么样，我觉得肯定讲得很好就是了。我在外面看到的，更多的是大家的科研情况，一直做得特别好。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呢？

黄晟：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很多学校都做了，但是做的东西基本不太实用，做的东西太理论了，太虚了一点。但是我们清华的教研院一直有一个传统，做的东西还是带有一点工科的风格，与学校的发展紧密相

关。我的建议还是坚持这个传统，虽然不一定在学术上能得到认可，但是我觉得它确实对于学校发展，对于全局，具有更大的意义。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黄晟：我们肯定是希望多了解学院的发展和信息。我加了教研院的微信号，但如果有机会能够更多地了解学院就更好了。只要学校和教研院有需要，我们当然愿意参与教研院的活动。

2006 级硕士研究生、2013 级博士研究生詹逸思 访谈

詹逸思，管理学硕士，教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

记者：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以及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到教研院学习？

詹逸思：选择教研院的动机就是自己喜欢做教育。我本科是在新闻学院读的，当时是新闻学院第一个转到教研院的学生。我来读硕士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自己觉得将来的发展兴趣和喜欢的事情都在教育领域，留校工作也是做教育相关工作，2009 年到 2011 年在校团委，2011 年调到学生学习与发展中心。后来之所以又选择读博士还是因为觉得工作中有一些任务，自己的储备不足，在研究方面还有所欠缺，所以就报考了教育博士。

记者：您在教研院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吗？

詹逸思：我首先说硕士阶段。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参与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实践，那个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站上讲台给初中的同学做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还有情绪心理方面的辅导。当时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系统的备课，每个人都带一个很大的班，覆盖面很广。我觉得一起去实践的同学们在实践过程中有很多的交流，感情也很好。

博士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是课程，两门方法课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在外系选修了一些课让我收获也很大。张羽老师的方法课当时都是全英文授课，我觉得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我学到很多东西，主要是研究的思路还有规范的方法，同时也接受了很大的挑战性。以前我都没有被这么训练过，所以印象很深刻。还有跟着李曼丽老师参与一些课题，虽然是跨界的课题。我们当时跟其他博士生一起合作，参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课题，大学学习适应方面的课题。在参与这些课题的过程中会充实学到的一些方法知识，拓宽思路。

还有一部分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博士本身的训练过程，例如要写博士论文，要发表学术文章，所以在这些方面学术研究功底就需要夯实。李曼丽老师的要求也比较高，我觉得跟着李曼丽老师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收获也非常大，对我思维上的挑战还有思维的逻辑性、严谨性以及学术的规范等方面，李曼丽老师指导的特别多。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期待？以及对校友工作、院友工作有什么期待？

詹逸思：我觉得教研院这几年发展还是很快的，做了一批研究院的设立，比如说未来学习科学研究院，我觉得可以坚持继续做下去。在某些方向上面持续推进，然后深耕细作持续的发表文章，对中国教育界的教育问题有更透彻的研究和思想贡献，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此外，在硕士的培养方面，尤其是针对非学术性的硕士培养方面，我觉得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硕士生想去做实践，比较大的几个方向就是人力资源、政府部门，还有一部分想去当老师。所以我觉得可以加强政治能力提高的课程和实践的环节，学生对这个方面会有更多的需求。

2009 级硕士研究生谢梦访谈

谢梦，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9 级硕士生，其后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政策与管理方向的博士，毕业后入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担任助理教授。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谢梦：本科保送阶段我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或者说是不同的教育实践领域感兴趣，一个是幼儿教育，一个是高等教育。清华的保研面试最早，很多学校是在国庆假期后，而清华是在国庆假期前，保研结果很快出来，我得到 offer 心满意足，那时候很贪玩儿，国庆假期就出去玩儿了。

这是非常巧合的一方面，但是也有深思熟虑的一方面。我从高中分科后就一直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思维上比较天马行空，我意识到需要浸润在不同的学科环境中去塑造自己的性格与思维特征。十年前的清华在

我们心中就是典型的理工科学校，科学严谨，我需要到这样的学校中去塑造思维与性格中的另外一面。概括而言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做。当然是学有所获，但是其实对我思维性格等各方面进行转型塑造的是攻读博士期间，尤其是在进行学术研究与撰写论文期间。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谢梦：印象深刻的事情实在太多。比如班级见面会上有同学介绍我是管浏斯，浏阳河的浏，斯大林的斯。这位从北师大保研而来的非常优秀且有能量的江西小姑娘最后成为了我的室友（之一）。比如参加史老师的大学生学情调查课题，课题组成员一起工作的无数个场景。比如李老师非常健谈的指导与对学生发展的关切。比如喜喝可乐的王老师温暖的笑容与丰富的故事。比如罗老师课程中知识性的启发与别具一格的校园实践。比如经常在办公室工作还穿着老布鞋的本涛老师，随时校园遇上都要督促“抓紧”学业与课题。比如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来到清华讲座时二教的人山人海。比如访谈李学勤先生、柳百成院士、李亚栋院士等，他们对于清华学生的请教是那么的有热忱。比如百年校庆时的各种纪念活动以及师弟子化了浓妆的脸。比如跟严羽在寒冬深夜于紫操躺在草坪

上看流星雨。比如毕业长跑时习大大来到紫操看望毕业生，正好朝着我们站的方向走来我跟他握了手。比如毕业离校的那一天。

记者： 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谢梦： 教研院的学习经历给予了我厚重的底色。既是做人的厚重，也是从事教育领域实践与研究工作的厚重。因为有来处，对于当下与未来的路走得如此坚定。记得教研院求学期间的一门课程中讨论到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读到“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感动之余并无深切理解。在我毕业踏入学术职业这个领地之后才意识到那些光环下的荆棘，而踏过荆棘笃定追求学术探究，怀揣至善之心培育学生的人才真正得以敬重。清华园的求学经历则不断告诫我要自强不息。我记得在博士论文做的最艰辛的阶段，甚至找出了西南联大时“刚毅坚卓”的校训以砥砺自己。其实清华留给我们的还有包容与谦卑，这种包容是源自于自信与底气，而谦卑是学堂路上的素色与荷塘前的一抹雅气。清华学堂前的路上曾经有王国维、陈寅恪踱步；从身边经过的自行车与白衬衣可能是某位科学家、院士、未来的某某某。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來，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谢梦：且不说这十年，近些年感慨教研院一年就是一个新的面貌与气象，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文南楼。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中，教研院无论是自身的建设发展，还是为学校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谢梦：清华大学终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期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也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院，做一流的学问，培养一流的人才。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谢梦：一入清华园，终身清华人。无论几时毕业，无论今日在何地，都不曾离开一刻。清华的一抹紫色与 IOE 三个符号镌刻在我们身上。期望校友工作能进一步密切校友与校友、校友与教研院、校友与学校之间的交流联系与支持。

2010 级博士研究生陆一访谈

陆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2010 级教育学博士，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学，拔尖人才培养，通识教育，教育考试改革政策，院校研究。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来到清华教研院进行学习？

陆一：硕士期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学习的专业是教育社会学。在此期间，我确定了自己今后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尤其是要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在东京大学就读期间，我得到了很好的教育社会学基本训练和跨文化的视角与体悟，一些老师也让我体会到了到一流教育学者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教育问题宏观的思考与深深的关切，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扎实的贡献。于是我决心要回到中国的土壤，这样才能更好的把握社会教育问题的脉动。同时我又希望能就读一所与复旦大学、东京大学风格挺不一样的一流大学，所以就选择到清华读博。

记者：您在教研院学习的时候，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陆一：主要是我参与的学术研究，我非常乐在其中。我回国读博不久便开始寻找研究方向，正好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机会。当时清华开始建设“学堂班”，就是后来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当时“钱学森力学班”的首席教授郑泉水老师找到我的导师史静寰老师，表示希望在“学堂班”教学改革实验的过程当中，教育研究者也能够参与进去，对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进行跟踪式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主题，我们多年来做了许多类似的教育改革实践，但几乎没有学术化的记录、提炼和讨论，思考落在了行动后头。同时，这也是个比较难得的机会，郑老师的真诚、开放和教育情怀十分有感染力，如果没有主事者的邀请，研究者很难有机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到这样活生生的教育实验中去。我当时一听，马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虽然还不知道从何入手，但肯定值得做。于是我就有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整个博士就读的过程当中，我一方面努力探索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去做这项研究，经常跑去和史老师讨论，一开始零敲碎打，后来逐渐有了点滴进展。另一方面，我平日密切地跟钱学森班的师生进行

各种交流、访谈，有时也直接参与他们的教育方案设计，问题研判和改革的讨论等等。这应该就是博士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了，这个案例确实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觉得很有参与感，同时也尝到教育学研究的一点点成就感，开启了我一直持续到今天，可能还要做上个十年的研究道路。

记者：您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一些困难？您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陆一：从头到尾都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个大的困难是，没有类似的现成研究可以参考。一方面，它是中国特色的一种案例，国外也很少有这种大学的实验班式的实践。国外文献中，现成理论好像有些相关，但其实无法指导我们的实践。国内虽然有很多实践，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科大少年班开始，就一直有这类教育实践，而且确实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但是我们无法从理论高度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种种具体的措施、细节安排，背后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潜在的问题、反思中的遗憾。开题时有老师直接提出了担忧，认为这个不好做呀。的确，这是一片新天地，作为学位论文，几乎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不知道多深的坑——还得自己填。但是，这也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吧。所

以，我只好一边和实践互动，一边看很多书，一边和老师讨论，慢慢磨合出来。找到研究的起点、重心、方向和边界，使这项初步的研究变得可行……在那个过程中我领悟到一点，教育研究不是用些什么方法、技巧去对研究对象漠然地做些操作，而要把自己放进去，把许多切身体会融入进去。随着研究一点点推进，实验班也在不断优化，而我自己在其中也有了很多的成长。

我觉得教育学的博士研究中，要回应自己内心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我国的教育事业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学术拓荒，也只有这种问题能变成一条不断延展的学术道路，而不会戛然而止在论文完成的那一刻。当然这会冒一定的风险，前面可能没有清晰的道路，也不一定能成功，却是值得的，要给自己一个冒险挑战的机会。很感谢导师鼓励我放手去做，并且一路引导支持。最后我觉得论文做得并不太成功，那个“大坑”显然没有填满，只是形式上完成了。好在算是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我们提出“学术志趣”的养成是当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本科阶段的首要任务，这个观念后来得到了许多积极的反响，在不同层次的政策文本中也有所体现。

记者：您在学习之余的生活过程中，有哪些心得体会？

陆一：我当时参加了研究生会，我读书期间的 2011 年正好是清华的百年校庆，所以印象也很深刻。因为我从博士才开始进入清华大学，博士的学习和科研工作非常专门化，基本上不太会和清华的其他学院、专业院系有过多的接触。但是学生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整个清华不同的专业的人，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优秀。我参与筹建了研究生会的新闻中心，这需要我们站在清华的层面去考虑问题，在做事时也要思考到什么是清华的传统。这些经历使我觉得我真正上过清华，让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清华学生。

当然很特殊的是，我们研究的领域是高等教育，就是大学。所以，我投入学生工作也带有专业的热情。如同我刚才所说，我能够理解清华大学这件事本身，对我的专业也很有帮助。学术既需要持久、规律性地花功夫，也需要一些创造性的灵感，所以还是得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又顺着自己性情的弹性。太过机械的钻研可能会抑制一些灵感的迸发。我喜欢学术职业，因为它允许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能逼迫你去认清自己的生活 and 习性，为自己做好安排。我觉得人很难做长

期规划，“规划”这个词过于具体了，比如说什么时间要做到什么，这就很难。是不是把人生看得过于按部就班了呢？抱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志向，交到一些非常好的师友，还有积极地关注这个时代和这片土地上的命题，我觉得这些东西会带来长期的活生生的指引，而不是死板的“路线规划”。

记者：您在读博士期间，和面对高校对青年教师的指标时，是否曾有过较大的心理压力？

陆一：组织上、制度上的那些指标自有它的逻辑和道理，我们身在其中，虽然会受到各种考核指标的影响，但还是有自己的空间。我不反对指标，但我无法按照指标来生活。“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话虽漂亮，但模糊了焦点。前程是自己的，得自己负责吧，人总要在制度的框架下找到自己的生长空间。更重要的是，我的价值感、意义感不是被那一些指标规定的，“指标”就是个外行嘛。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学者、希望完成什么样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生活指引。

记者：请问您对还在教研院读书的师弟师妹们有什么建议？

陆一：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读书。我们当时自己组织了经典读书小组，大家一起读了几本，自己一个人可能读不下来，但是在一起读能擦出许多火花。这也是我学生时代特别美好的回忆，一起坚持读过书的肯定是真朋友。我们也要努力把整个文科的经典奠基在教育学专业之下，不要把读书自我设限在所谓专业之内。

2011 级博士研究生王顶明访谈

王顶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2011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生、2014 级教育学博士后，现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挂职）。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王顶明：我来到清华教研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个人研究兴趣和工作都跟研究生教育高度相关，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生的专业认同调研，研究生毕业之后又一直在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工作，因此特别希望在研究生教育领域进一步深造。清华教研院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具备国内最好的师资和一流的平台，因此，我把这里作为了自己读博的首选。另一方面，清华可能是大家都向往的名校，在我内心深处也一直向往有一天能到清华读书，考博前也曾多次进校园。可以说，是兴趣的驱使，让我慕名而来，也让自己圆了一个名校梦。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王顶明：在教研院学习生活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我主要分享两个方面吧。首先是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与过程让我印象深刻。在专业培养上，老师们大多采取基于科研项目的培养方式，不仅锻炼了我们的专业研究能力、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国家层面的、学科前沿的研究任务，培养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教育情怀和学术情怀。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上，学校的老师、学院的老师以及方方面面的管理人员都在教学与管理工作中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态度，真正的尊重、关心学生的行事风格让我铭记于心。为师先做人，育人先正己，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想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行胜于言的校风，我接触的每一位老师都是这么贯彻和落实的，无论是学业上的老师，还是生活食宿上的管理人员，跟他们交往时都能感受到来自对方细致入微的、诚挚的关心与尊重。当然，这与我们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强调价值塑造的理念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其次是导师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我的两个导师（袁本涛老师和史静寰老师）都是在各自研究领域具有非常深的学

术造诣和影响力的专家，同时又是非常认真和投入地工作的前辈。这种敬业精神、专业素养不得不令人折服。我常常想，清华所倡导的“又红又专”，一方面必须要有高度的专业化、高水平的专业度，如果你专业不行，纯粹是讲“红”，那可能只是“口号式”的专家；另一方面是虔诚地为国家做事的投入与奉献，如果你只有专业、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那可能是技术上的强人、单面人，不一定是德才兼备的人。从导师们的身上，我更加理解和认同“又红又专”的精神实质。

记者： 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王顶明： 我在教研院的两段经历即博士和博士后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与提升期。这两段经历既补了我的短板，也为我下一步的发展积聚了力量。我在教研院的学习一直受益于导师们的精心指导、率先垂范，也得益于老师们提供的课题津贴、研究支持，让我能够心无旁骛的投身于专业学习与研究。这种投入当时来看虽然很难直观看到预期效果，但是我现在这几年非常受益于当初的学术训练与科研积累，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会伴随我终生。它让我看问题的视野更加开阔，因为这样的科研平台，参与的课题项目站位不一样，我们会特别关注考虑国

家战略、社会需要、国际前沿，以及我们差距在哪、优势在哪、下一步的走向和趋势在哪，这种视野上的锻炼和培养，总的来说是受益的。我们经常讲，人要有大视野、大格局才可能上大舞台、有大作为，所以我在教研院的学习与研究经历，对现在来讲或者甚至对将来来讲都很受益。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王顶明：我是建院后才来读书的，刚好处在承前启后的过程。从学院的发展来讲，这几年是一个黄金时期。因为作为一个研究所和现在作为二级的院系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是不一样的，学校层面对学院的关注，学校资源对学院的投入和给到学生的机会都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明显能感觉到这几年院里的发展处于上升态势，在全国同行来看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综合大学里面，我们这种小而精的学院非常具有特色和影响力，而且是国际和国内双方面的影响力，这得益于老师们的投入和奉献，也得益于这些年院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的共同努力，所以从这个变化确实看得出来院里面的成长和未来可期待的发展空间。

记者：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从教育研究室，到教育研究所，到教育研究院），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王顶明：作为期待来讲，肯定希望学院越办越好，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院。因为现在和世界最顶级的研究院来比，我们还有差距。无论是人才队伍，还是环境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希望有个独立的办公楼，目前两个地方办公（建筑馆一层，文南楼一层）存在诸多不便，也不利于学生交往、学术交流。

从建议的角度来讲，第一，在学科方向的凝练上，希望院里今后继续在传承和创新上去努力。传承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的优势学科，如工程教育，有发展优势，还需要坚持、要加强。创新是因为教育在不断与时俱进，在和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有新的学科的生长点，那么在这种学科新的生长点、增长点中间怎么找到我们觉得可以去努力的方向，而且要在这个方向中间成为全国的引领者，甚至是全球的引领者，这需要 we 快速、准确的去捕捉这种机会。

第二，扩大学院的影响力上。从我自己走出学院的角度来讲，这个影响力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国际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合作。目前咱

们师生国际交流已经很多，但是国际间的实质性、高水平的合作可能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是如何扩大国内的影响力，包括把原有的资源力量整合好。我们经常讲清华有三宝：校训、校园和校友。这么多年教研院积累了不少校友，这个群体可能有很多潜在的资源 and 能量，我们期待院里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活动，来把大家的潜力发挥出来。

从我个人来讲，我的成长与发展受益于学院，受益于学校，我非常愿意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学院的发展尽绵薄之力，我想这也是大部分校友的想法。但是仅仅依靠院里自有的老师和学生的力量还是有限的。现在有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就是一切对学院有帮助的都是朋友，都是院友，建议把更广义的院友的概念变成我们整合资源的手段与理念，然后把它转化为真正办学中间的资源 and 实力。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王顶明：因为我们从事专业领域研究，不像在商业领域的可以给学院捐大笔的钱，更多的是通过来学院交流、对学科的发展、学生专业能力培养以及职业规划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

承蒙学院的信任，我被推选为院友理事会第一批副会长，也是第一批院友导师。拿聘书时，我是诚惶诚恐的。现在来看，也感到很惭愧的，因为我没做好相关工作。今后的话，希望这学院能够将这方面的工作常态化，用长效性的方式来把这个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也希望在校的学生们更加主动一点，把这些沟通交流的渠道设计起来，根据个人兴趣进行匹配，主动地和院友进行交流，建立互动的机制，真正使交流互动落到实处。

2012 级硕士研究生史安璐访谈

史安璐，2012 级入学教研院公共管理专业，2015 年硕士毕业后到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目前主要从事人力资源薪酬管理工作。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史安璐：我在清华外文系读本科，硕士来到教研院，在清华的八年就没离开过文南楼，就是从楼下到楼上。当时觉得语言专业太工具类了，还是想学一个兼顾专业性和实用性的专业。我对管理类的专业相对比较感兴趣，正好又知道了教研院有公共管理的硕士，是与教育相关的，当时也想着未来能够在学校里面工作，并且对教育类专业挺感兴趣的，因为在本科的时候也参与了不少支教类项目，比如中美扶贫支教组织，我们和美国学生一起去一些偏远山区支教，我之前参加过几次觉得对教育还是有一定的向往，而且跟管理还能挂钩，所以当时保研的时候就只选择了教研院，然后就来这边学习。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史安璐：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是参加课题组的学术研究工作。因为硕士期间的教学培养方式跟本科还是不大一样，本科的时候主要以上课为主，学生一般处于“散养”的状态，也没有认认真真做过什么科研项目。来到教研院之后，接触的第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工程教育，我的硕士论文也与工程教育相关。当时加入工程教育课题组，有曼丽老师还有王爷爷。王爷爷他做事的风格还有为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王爷爷是儒雅的风格同时又很幽默；王爷爷懂得也很多，有些东西他讲的方式和别人讲出来的还不大一样。在那个课题组就觉得既有学术科研方面的提升，同时还能把科研做得很有意思。此外，我还在院里做一些社会工作，比如院研团总支书记、党建助理，还有就业助理。具体做了些什么其实我已经记不大清了，但是在做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使我跟同学和老师的关系更加紧密、走得更近了。

记者：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史安璐：就像刚刚讲到的，课题组工作和学生工作对我锻炼还是蛮大的。此外，还有一些课程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现在从事的是人力资

源工作，当时和这个相关的唯一的一门课就是曼丽老师的《人力资源开发》，给我的启发挺大的。曼丽老师还有王爷爷给我们上课时，会请一些校外的嘉宾来做分享，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打开视野。我觉得这些课程是很有记忆点的，印象也是特别深刻。

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生活有很大帮助，尤其是研究能力。我现在是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负责人力资源部的薪酬管理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之前没有做过、具有创新性的一些内容，尤其在国企改革背景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也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新的探索、新的项目，这需要一定的研究能力，去发现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试着去解释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然后想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在教研院读研时，除了学习知识外，也学习到了研究的基本思维、规律和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我觉得教研院的“教育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教研院培养的学生的责任心、原则性，包括一些换位思考的能力。跟着曼丽老师读书，她热爱生活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在教研

院所获的，不论是研究能力、价值观还是生活品位，都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史安璐：我感觉教研院更多样化了，目前老师们的研究领域更与时俱进、更科学、更面向未来了。比如张羽老师研究学习科学，都开始使用仪器了，这个还是挺先进、挺有趣的。我觉得这些多样性、多元性和先进性的研究，是很令人振奋的。

我从 2012 年入学到现在，已经是七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教研院现在更有自信了，很多时候更有话语权了。我现在经常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发现教研院开始加强了对自己的宣传包装，有了走出去的意识和行动，会更加自信地参与到学校的重要课题或者重要决策中，与此同时，老师们不仅围绕大学开展研究，也开始往下延伸、纵向延伸，也与很多企业开展合作，能够更应用化、更自信，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因为教育最终目的的一定不是坐在那里搞研究，而是能够将好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去真正应用和实践，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孩子受益，我觉得这是教育最大

的一个目的。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两年，教研院一是更自信了，二是更开放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记者：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从教育研究室，到教育研究所，到教育研究院），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史安璐：希望教研院能够拓展一下学生培养方面的内容，一是更个性化一点，二是把教育元素更加强一些，另外也能提供就业辅导以及更成熟、更个性化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如果某些学生确实不想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引导他们多去学一些其他学院的课程，从其他学院的课程或者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去学习一些东西，再反过来看教育相关研究，我觉得有些时候帮助会更大一些，思路会更开放。总的来说，就是希望学生培养方案的模式可以更多元化一些，包括可以建立一些实习平台。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史安璐：我觉得校友工作可以更系统性一些。除了依托周年院庆或者校庆等活动进行联系外，在平时的时候，如果有好的讲座信息，其实也可以跟各位校友分享一下，尤其对于那些仍在从事教育工作的校友，

这种前沿的、专业的讲座和会议，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把这种因为特殊时间点才串起来的校友工作，再铺开一点，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同时，多吸纳一些活跃的校友参与到其中，大家共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友活动。

2012 级博士研究生马婧访谈

马婧，2017 年 4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高校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发展，大学生学情研究，虚拟现实环境与教学模式研究。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马婧：我和别人可能不太一样。我原先在美国留学，2010 年回国工作了 2 年，此后到了清华大学教研院下的教育技术研究所继续深造。当时我跟着程建钢导师，由于他和我的研究方向都是教育技术学，而且他很想让我读他的博士，所以我就考到了教研院。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马婧：我想主要谈谈自己博士期间撰写英文论文的经历。我从博士二年级就开始写，大概边写边修改了一年左右，在博士三年级开学的 9 月份发表在一份非常不错的 SSCI 期刊上。当时国内教育学发英文 SSCI

期刊的还很少，而且貌似在咱们院内也寥寥无几。这段经历给我的感触很深，写文章、投稿就应该尽早入手，不能等到后面。要经常利用院内提供的机会和国外专家接触、交流。咱们学院经常会请一些国内外知名专家过来，这个机会很重要，和他们谈话过程中，你就能有很好的想法。我当时那篇文章也是韩锡斌老师让我和院里邀请的专家沟通后得到的灵感。举例来说，当时我的选题可能不太新颖，和专家交谈后就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因为这些专家都接触过很多期刊，他们知道这个题目有没有过时，值不值得发表。

记者： 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马婧： 清华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带给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在品格上，我学到了什么是责任感，什么是家国情怀。作为清华人，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生活的好坏，除了你自己，还要更多考虑自己社会使命。更进一步，我是教研院的学生，现在我在郑大教的也是学教育学的学生。我知道，老师的一句话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所以一定得将爱国的情怀融入教育中。我会在课上告诉他们，作为教育者，不能只关注自己有没有吃饱穿暖。哪怕以后不从事老师的职业，只要对中国的教育

发展有一点点贡献，也是创造了价值。这就是清华教研院带给我的，也是我力图让学生学到的一种情怀。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要站得更高，要将自己的知识反馈给社会，这就是不一样。

在学术上，我常常思考教研院培养学术人才的路径。韩锡斌老师一直说，做学术是讲究天分的，如果适合做学术，你就会觉得很快乐。我经常给学生介绍咱们院的课程设置体系，因为我深刻感受到这一培养体系对我的学术能力、科研能力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我选的课不是特别多，但是当一年后我开始好好写文章后，我发现这些课程设置丰富而全面。比如我们的研究方法类课程有专门的定量教育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含了很多高级统计学的知识，做得很专业，学得也挺扎实。此外，课程的跨学科视角也让我受益颇深，如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上，我体会到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和我们教育学科有明显差异，让我理解了拥有新视角的重要性。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马婧：目前我觉得咱们学院在引进人才方面做得不错，比如近年咱们学院新引进的石中英、Hamish Coates 等著名学者教授，拥有海外知名高校背景的老师也很多。一般人可能以为清华是一个偏理工的学校，教育可能没那么强，但我认为其实不是，关键还是在人才。只要能吸引各个领域的人才，咱们院以后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记者：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从教育研究室，到教育研究所，到教育研究院），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马婧：希望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强一下，进一步扩大规模，汇聚更多人才，巩固学术根基。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马婧：目前我和清华联系不多，虽然一直想参加清华或院内校友会的活动，也订阅了一些关于清华教育的期刊杂志，但一直没有机会了解和参与。我个人希望学术上能多交流，有学术活动可以一起参加，或者不同行业、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的毕业生能组织在一起联络。我对 10 月底的院庆活动也有很大期待，如果有学术交流环节希望能共同参与。

2014 级硕士研究生周雪涵访谈

周雪涵,2014 级教研院硕士研究生,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周雪涵:对本科所学专业兴趣不大,但对教育问题、教育研究兴趣浓厚,因此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清华教研院。同时,自己很希望研究生时可以做定量方面的研究,所以非常坚定地选择张羽老师作导师。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周雪涵:导师帮助自己在教研院读书时摆脱迷茫:研究生入学时眼光比较窄,没有对未来有很好的规划,在跟随导师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将学术研究确立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研究生期间也以学术类活动作为自己生活和学习的重心,并在毕业后选择了出国读博深造,希望将来能够回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记者： 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周雪涵：在教研院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尤其是做课题项目、实地研究的经验和积累，让自己体会到教育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更加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目标，逐渐摆脱了入学时的迷茫。

记者： 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來，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周雪涵： 教研院是一个十分温馨的集体，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自己同每位同学、每位老师都能建立相对亲切紧密的联系，让人觉得非常温暖。记得自己入学时，感觉教研院规模很小，在学校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慢慢地，教研院在学校中的地位提高了，实验室和研究所的数量增加了，各项活动也渐渐丰富起来了。教研院不断发展，并且一直向好。

记者： 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周雪涵： 制度层面：建议可以尝试 mentor 制，请高年级学生一对一给新入学的低年级学生提供学习、生活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让刚刚进入教研院的新生能够较快融入集体、适应研究生生活，形成学院传帮带

的风气与传递文化。学生发展层面：除整体培养方案外，可以尝试为教研院的学生设立各个阶段的培养目标和需要完成的任务，更重视过程性培养。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周雪涵：建议可以加强校友间的联系，比如创立校友间的在线协同编辑文档，提供每位校友的简介、联系方式（如邮箱），方便校友间的交流和相互请教。自己作为校友，也很乐意与其他校友建立联系，尽自己所能让校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2014 级硕士研究生沈阳访谈

沈阳，女子国际特级大师，男子国际大师，国际运动健将。世界少年、青年冠军，世界奥林匹克团体冠军，世界团体冠军。2014 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工商管理专业，2019 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学专业，获校优秀毕业论文。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沈阳：凭借优异的竞技体育成绩进入清华经管学习，本科阶段经常参加国际象棋比赛，考虑年纪稍长之后从事国际象棋教练的工作。结合自己的职业生涯，研究生阶段选择来到教研院学习，希望学习到有关教育的知识和方法，扮演好教育者的角色，当一名合格的国际象棋教练。

记者：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沈阳：研究生阶段比赛依旧较多，前期落下了一些课程，后期选择了较多课程，从中学到了很多；导师不辞辛劳地帮助解决在毕业论文撰

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教研院的几年里，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结婚和生宝宝；每次组会分享收获良多，感受到了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博大精深。

记者：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沈阳：在教研院学习到了教育学知识，也切身感受到了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在从事国际象棋教练工作时，能够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且做到启发式、引导式教学，耐心指导学生多思、多想。另一方面，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会注意方式方法，耐心沟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引导孩子向好、向善。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沈阳：教研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老师们对每位学生非常有耐心，十分愿意帮助我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同学之间也都互助友爱。

本科的经管学院与教研院在学院规模上差异较大，教研院是一个规模较小的院系，授课方式以小班教学为主，起初这让我感到非常新奇，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认为这种授课方式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学生都有独立思考和表达意见的机会，能够锻炼思维逻辑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另外，我切实感受到这些年教研院在变好，向着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国际化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学院发展更加受到学校的重视。

记者：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从教育研究室，到教育研究所，到教育研究院），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沈阳：（1）建议：建议可以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良好的学前教育对个人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有助于启发思维、培养良好品格等。国家现在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鼓励生育，从现实意义来说，可以帮助家庭更好地应对育儿问题，浇灌好祖国的花朵。

（2）期望：希望教研院能越来越好，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希望师弟师妹们能够学有所获，不负青春。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沈阳：建议可以加强校友间的联系，创建校友通讯录，建立校友微信群，方便校友之间沟通、交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定期组织校友交流会，为优秀校友提供一个分享经验和资源的平台。

2016 级硕士研究生狄迪访谈

狄迪,2016 级教育研究院硕士生,在校期间拍摄 3 部招生宣传片,2019 年《从一到无穷大》获得超过 1 亿次点击,引发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广泛关注。目前从事电影制片工作。

记者: 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狄迪: 一方面,因为我一直对教育有关注、有兴趣,本科的时候也做过很多在线的课程。另一方面,我本科是新闻系的,想换一个专业,做一些交叉,觉得会比较好一些。我一直在做一些大学的宣传片,想学习一下教育传播上有哪些应该拓展的点。在本质上还是要更了解教育,了解教育的内涵,才能做的更好。

记者: 您在教研院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狄迪: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在研一和研三的时候分别给清华大学做了一个向教育部汇报的短片和一个宣传片。两部片子都是从教

育视角出发，第一个讲的是教育公平，第二个讲的是清华大学因材施教和专项计划对于学生人才鼓励的主题，用的史静寰老师课题组“第一代大学学生的学习情况”的数据。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能把学院的研究和理念融入到大众宣传中去，最后的传播效果都非常好。

在求学期间，另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我是教研院第一个研究生特等奖学金的候选人。也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做了2018年的教育宣传片以及向教育部汇报的短片，向外界发出更多教研院的声音。

记者：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狄迪：我现在主要做文化内容上的投资，也会做一些教育项目的投资。整体上，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开展项目还是很有帮助的。由于我的导师不在院内，给了我很多自己做项目的空间，像之前提到的重大发布会或者视频创作，以及整个招生的方案，都给我非常好的机会去培养自己项目管理、团队管理的能力，并学会怎么将教研院的特色更好地展现出来。

记者：您现在对教研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这四十年以来，教研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狄迪：清华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教研院也在不断发展，朝着成为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学术机构的目标在努力，这是我对教研院的印象。教研室在 1979 年建立，从一个学科慢慢发展到研究所。在这个过程中，是顺应清华大学的发展和中国教育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1979 年，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些高考刚刚恢复改革后的问题。随着清华大学有更多文科学科的回归还有工科教育的发展，教育研究所需要应对这些问题，总结清华大学优势的经验，同时服务清华整体的教育需要。到设立学院后，逐渐面向全球引进师资和研究人员，并把清华大学的优势教育经验加以总结并向全国推广。

记者：今年是教研院成立 40 周年，对教研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狄迪：从考虑学科交叉综合的角度，可以保留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吸引更多优秀的同学到清华教研院读研。

记者：您对教研院的校友工作有什么期待？

狄迪：校友联系工作近几年正在逐步开展，既取得一定成果，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现在校友之间彼此都不太熟悉整体情况，还需要在

加强校友联系上努力。同时，学院可以通过 EDD 校友，为更多有志于基础教育和从事教育领域工作的同学们提供实习和实践的机会，更好地服务同学们的发展和就业。

记者：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教研院的发展建设中来？

狄迪：愿意通过给学弟学妹们提供职业发展指导和捐赠的方式，支持学院事业发展。

2016 级博士研究生丁若曦访谈

丁若曦，2016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生涯探索，大中衔接。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清华教研院学习？

丁若曦：一是我比较早就确立了以学术研究为生涯发展的目标。但通过本科前三年的专业学习和实践，尽管成绩还不错，但没有找到在该专业特别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所以愈发觉得对于自己而言，这个专业没有能够激发自己的挑战感。

二是通过本科通识课程的学习，我对于教育有关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产生了深入研究的想法和兴趣。自己及身边同学在学习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困惑和迷茫，也鼓励我自己去探索、去解答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

三是推研时，我的成绩可以允许我比较自由地选择跨专业推免。综合以上两点，我选择了报考教研院的直博项目——这既符合自己的生涯目标，也满足自己对于教育研究的兴趣，更能为自己带来挑战感和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记者：教研院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帮助？

丁若曦：我认为教研院最有特点的是学生间自发的合作氛围，也包括师姐师兄与师妹师弟之间自发形成的“传帮带”的传统。我们学院的课题组，很多都是高年级的同学带领低年级的同学，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研究工作。我们学院每一届的研工助理，也是与上、下届的研工助理紧密合作，将经验、教训、为学院服务的初心不断传递。我们学院的博士生论坛，从第一届的院内会议到如今辐射全国的规模，也离不开一届一届组委会的彼此合作与帮扶。

记者：您觉得教研院给您带来了什么？

丁若曦：在国外访学这段时间，我发现合作精神着实是非常宝贵的。我所在的访学学院，整体研究实力很强。但研究生们崇尚个人主义，即便是课程合作作业都较为抗拒。不同导师的博士生，可能对于彼此的研

究领域、博士论文的主题，了解也不多。在这样的组织模式下，他们形成了个性化研究、多元化发展的“百花齐放”态势，但也使许多学生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感到“无援”。在研究生学习研究过程中的合作，一方面能让我们与身边同学建立信任，在未来我们都是彼此学术生涯中可以依靠、扶持的挚友。另一方面，在学习研究过程中组织合作，是对个人领导力潜移默化的培养。在教研院这种合作氛围中锻炼的能力，相信对于大家未来的研究、工作都是非常有利的支持。

